

中山文史

总第 11 辑

94/129/0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

《中山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

目 录

孙中山先生关注农民问题

..... 冯卓楠 李旭昭 (1)

程一鸣传略 钟文吏整理 (5)

黄居素传略 幼 苗 (11)

我的父亲唐绍仪 唐宝璜 (14)

唐绍仪在中山 赵荣芳 (21)

魏邦平的一生 魏永怡 (28)

梁龙腾事略 阮子元 (33)

中山籍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 萧 嘉 (37)

清代名外交家郑藻如传略 黄方华 (42)

郑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

..... 余蕴洁 吴冉彬 徐綺妮 (49)

彼岸先生及其先德昆季之二三事

..... 铁城退士 (56)

忆念郑彼岸先生对我的训迪和嘱托

..... 何仰儒 (60)

讲话句句有“头”共五十个“头”。

——郑彼岸先生及其在解放初一次讲话 高民川辑 (62)

从新发现的《郑雍陌祖房谱》谈郑官应的一些
历史资料 黄文正 (64)

胡汉民在龙山书院 黄联安 (69)

何乃中小传..... 何仰楠 (71)

张炎将军夫人郑坤廉..... 昭 楹 (73)

热心社会公益的郑宝如

.....向明口述 兆民执笔 (76)

回忆先父毛研陆.....毛公弼 (79)

南园今五子之一李洸略历.....卢新贡 (80)

管窥黄季鸾风范.....郭浩如 (81)

附郭浩如题黄季鸾诗稿一翼..... (82)

三十年代的田径名运动员郑纪航

.....李旭昭 (85)

香山人物室名别号索引小考 (一)

.....何文广 (88)

质疑补充订正二则:

香山立县与香山故镇的有关探讨.....李汉超 (90)

香山寨并非建于隋唐.....郑华冠 (93)

鸣 谢.....《中山文史》编委会 (94)

第八、九辑合刊和第十辑勘误..... (94)

稿 约..... (96)

封 面: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毛公弼

孙中山先生关注农民问题

冯焯楠 李旭昭

编者按：今年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二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发表此文，以表示纪念。

孙中山先生对祖国历史很有研究，他熟记“后稷教民稼穡，树气五谷，五谷熟而人民育”的道理。他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许行并耕”，“李悝尽地利”，秦商鞅注重“田开阡陌而使富”，才能“勇战斗狠而使狠”，汉贾谊、晁错等政治家主张请积贮以备不时之需，“重农贵粟”等古往今来不易之道理，亦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对农民问题日益予以关注。

几千年来，我国均以农立国，农民为了过好一点生活，曾无数次向封建王朝冲击，但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问题。相反，在封建社会的层层盘剥下，农民的生活却是每况愈下。孙中山先生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对此从童年起就有所感受。孙中山先生的家境从祖辈起就非常贫寒，他的祖父孙敬贤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佃耕农，他的父亲孙达成在少年时就到澳门去当鞋匠，每月仅得四元工钱。后来回到翠亨村靠耕种两亩半田生活，还兼作村中更夫。清光绪三年二月十二日（一八六四年），孙达成和孙中山的叔叔学成、观

成将瑞英祖遗下的土名叫逕仔萌税山埔一段山荒租种，开荒辟园，以种果木，批期为五十年。从开荒辟园，经营农垦、种植果木维持生计这件事，便可以想像孙中山先生的父辈，家境是十分贫困的。

孙中山的童年时代在这样的家境下渡过，所以，他六岁就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动力。家里缺少燃料，他就和姐姐妙茜上金槟榔山打柴；农忙的时候，他就到农田里帮助家人干杂活；农闲时，他还得到田间除草或去山园种番茨、蔬菜。因为家境贫寒，孙中山十岁才入学塾读书。但他一家人辛勤的劳动，却仍然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一家五口住在一间小小的茅屋里，孙中山没有鞋子穿。对这种贫困生活，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时，曾很坦率地对一个外国人说，自己是苦力的儿子，自己也是苦力，是和穷人一起长大的。由于幼年渡过了这些艰苦岁月，因而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就打下了永远不灭的烙印。从此，他非常同情那些和他家境一样贫苦的农民，以后就对农民的同情出发，立下了为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而毕生奋斗的目标。

为了达到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他从青年时起就对农业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在大学本来是学医的，但在功课之余，他却精心钻研有关近代农业的书籍，希望运用这些科学知识改良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假期回乡时，他主动接近村里的农民伯伯，详细了解村中农民的生活状况、种植情况、土质情况，打算在乡间致力于蚕桑事业，以加速我县缫丝业的发展。他还写过好几篇关于发展农业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一八九〇年，他给我县开明官宦郑藻如的信中所提出的三点建议，第一个就是兴农问题。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中，除列举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货畅其流”四点纲领之外，他还着重提出“改良农业，为当今之急务”的政治见解。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发展我国农业，改善农民生活是急切要求的。可惜，他所提出的这些忧国忧民的建议，没能得到当时权贵的反应。真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八九六年，孙中山先生在英国伦敦蒙难脱险后，利用在伦敦继续居住了近一年的机会，经常去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博览政治、社会、经济、农业等书籍，并进一步研究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还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他还实地考察了英国社会经济状况，思想认识上有新的飞跃，他逐步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基础，但光谈改良，农民生活就不能得到彻底改善。鉴于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绅的手里。因此，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才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为此，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乃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以后，孙中山先生在许多谈话中，进一步阐明“平均地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九一二年，他对梁士诒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先生看到各地农民赤着双脚，携带扁担箩筐来广州参加会议时，他高兴极了，认为农民能参加讨论国家大事，是革命成功的标志。进一步认识到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性。是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解决农民问题的“耕者有其田”，列为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前的遗嘱中，还念念不忘“必须

唤起民众”，就是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实现新三民主义。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一生不忘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呢？一方面是孙中山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亲身体验到农民的悲惨生活，使他对农民寄以无限的同情，另一方面从中国革命的整体来看，他认为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农民问题不解决，讲中国革命等于一句空话。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改善农民生活的遗愿，并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廖仲恺先生，在广州开办了仲恺农校，引进了先进技术培训农业技术人才。几十年来，该校不断扩展，现在已成为中国华南地区有声望的农业专科学校。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爱国华侨马应彪先生得到岭南大学钟荣光校长的支持，经过几许艰难曲折，终于在岭南大学创办了农学院和农职班，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农业技术人才，为我国发展农业作出了贡献。但这些只是从发展农业技术力量上作了一些努力吧。而真正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使中国农民从政治经济上彻底翻身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才能得以实现。

程一鸣传略

钟文吏整理

程一鸣先生，一九〇七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中山市南朗镇亨美村的一个侨工家庭。八岁入私塾读书，十岁入本村小学，毕业后进入云衢中学就读。仅几个月，因母亲病死，父亲程爽续娶，他便停学做家务。

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后，程一鸣离家经香港，乘轮抵上海，进虬江路“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后又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器修理工人。

一九二六年夏，他曾到汉口，由姨父介绍到大智门附近一家机器厂做工，看到了革命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十月，程一鸣返回上海，在闸北青云桥光明电器厂做机器修理工，并住在青云路的一间民房亭子间，从而认识了同楼居住的上海大学学生马异（广东省海南岛人），开始接受了革命启蒙思想，并由马异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程一鸣按照马异的布置，在光明电器厂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逼近上海市，军阀孙传芳退守上海闸北区。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支援北伐军的口号，领导上海工人起来总罢工，把这次总罢工变为第二次武装起义。程一鸣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但这次武装起义遭受到孙传芳勾结帝国主义的镇压，当时有一百多工人被枪杀，几百工人被逮捕。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共党的领导下再次发动总罢工，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暂时取得了上海市的政权。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黑社会势力勾结，策划了“四·一二”大屠杀，三天之内杀害了三百多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

人失踪。“四·一二”大屠杀后，程一鸣还到各工厂区和一些工人联系，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八月，敌人对他加紧了缉捕。党为了他的安全，决定让他去苏联学习，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程一鸣按照党组织的通知，乘船到海参威再坐西伯利亚火车前往莫斯科，被安排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由于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影响，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清党中，程一鸣受到打击报复，给他定了阶级异己分子、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等三条罪名。一九三〇年五月毕业后，他和同学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铁锤镰刀”钢铁厂劳动改造。因表现积极，由工厂党支部建议送回中国工作。一九三〇年秋，程一鸣返回上海市，和中共闸北区委取得联系，被委任为五金机器工会党委书记。他一面在美昌洋行做工，一面由堂兄程保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活动，到各工厂和工人联系，组织秘密工会。直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因陈绍禹篡夺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程一鸣被通知，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从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以后，程一鸣在黑暗中徘徊，逐步堕落为特务。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程一鸣和亲戚卢吉珊都因为脱党后感到苦闷，希望能到西北去搞军运，便一起到了河南省陕县拜访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后因卢回上海照料学校，程一鸣接受卢的建议，留在陕西警备师政治部，搞宣传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程一鸣认定要马青苑革命没有希望了，便留下一

封信说要回上海搞抗日工作。程一鸣回到上海后，有时做工维持生活，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书，还出版过几期名叫《聊斋》的杂志。

一九三二年冬，有一批留苏学生叛变革命，成为国民党的特务。这时，国民党特务通过同学吴景中要程一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报到。此事引起了他的思想斗争。经过考虑，觉得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苏区革命根据地，但他认为陈绍禹一伙已把自己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逃往汉口，但汉口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最后他认为自己已和中共没有关系，抱着侥幸的心理，仍然留在上海。由于这一错误的抉择，致使他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春节，吴景中到程一鸣家拜年，又向他提到南京的事。在吴的怂恿下，程一鸣终于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南京。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说：“我一走下火车就成为叛徒，造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起初，他当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汽车系”的研究委员。过了几天，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约他谈话，要他为“领袖”效忠，并通过于国桢发给他一张“自新证”后，便离开了“留俄学生招待所”，不久，离开了交通研究院，返回上海。后又经同学邓文仪介绍到南昌，被派担任调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因南昌飞机场失火，烧毁飞机事件发生，蒋介石大怒，航空署署长徐培根被撤职的同时，调查课也被解散并入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被第一批调到南京，在复兴社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当股员，接着先后担任华南股和华东股股长。自一九三四年起，程一鸣当了多年情报教官。一九三七年爆发“八·一三”沪战后，程一鸣被调外勤任复兴社特务处苏州特别组中校组长。当时，“第三战区

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苏州，程一鸣负责搜集日军和汉奸活动的情报。苏州沦陷后，程一鸣到了上海，一九三八年春，任复兴社上海区书记，从事秘密的特务组织活动。八月后，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程一鸣被调到湖南省临澧县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专任情报教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在湖南省黔阳县任“军统局黔阳特训班”情报教官，因批评总队部的大队长、区队长经常殴打学员，被说拉拢学员，而被囚禁在贵州省息烽县“阳明坝监狱”，后又转押入“白公馆监狱”。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被释放后，调任甘肃省兰州市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任情报系主任教官、总教官。一九四一年春，调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公开的名义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第八战区执法总监部调查室”上校主任。一九四五年五月，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日本投降后，程一鸣随同戴笠，在上海社美路七十号成立军统局上海办事处，戴笠兼任上海处长，程一鸣任该处行动组组长，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结束，程一鸣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曾被派往昆明帮助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侦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件。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国防部保密局成立，程一鸣被任为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后又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一九四八年，程因不愿参加内战，于十月辞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十一月，从西安返抵广州市，决定离开国民党特务组织，常常跑到香港。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垮台后，躲在老家奉化溪口，在幕后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四月，蒋介石通过到

溪口的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通知程一鸣到溪口见他，蒋要程一鸣提出整顿保密局的意见，并组织一个特务的监察网，程不愿意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住几天后，借口要回广州和宋子文商量工作，返回了广州。

一九四九年五月，宋子文离粤经香港逃往美国后，薛岳继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程一鸣由同乡容有略（在广州任军长）力邀助薛岳，薛便任命程一鸣为广东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这时，他常常以“视导”为名返回澳门家里。七月，广州市成立“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程一鸣任稽查处处长，八月一日，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改为“保防处”，程自任保防处处长。仅仅两个多月，十月十三日早上，即广州市解放的前一天，程一鸣便和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共乘飞机逃往三灶岛，再坐船逃往澳门，以后迁居香港。

不久，台湾毛人凤（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派人到香港找程一鸣，他避而不见。毛人凤不满程的举动，造谣说他投奔大陆，向共党靠拢。并在程的人事卡上注上叛变字样。但在一九五一年冬天，国民党国防部又发表公报，任命程一鸣为“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后任国民党情报局澳门站少将站长。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要他到台湾去。一九五二年一月，程一鸣从香港到台北。郑介民和程都是留俄同学，知道程在莫斯科学过“游击战术”，便要程写一本《反共的游击战术》。七月，程返回香港，开始写此书，但他由于没有打过游击战争，闭门造车，无法写下去。于是，他到香港中环各书店去找有关游击战术的参考材料。在书店里看到毛主席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著作。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北市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捣毁美国驻台湾大使馆新闻处。这

件事也给程一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间，程在香港经常看到新中国出版的报刊，在电影院有时看到新中国的电影，读到各国对新中国的报道，又听到中国各地的广播，他逐渐了解到祖国的实际情况，促使他的立场转变。程为了了解新中国，在澳门星光书店订阅了《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从中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国民党空军人员徐廷泽驾机起义的消息和读到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的一段话“我们一再重申：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职位的高低，过去犯了多大的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弃暗投明，起义归来，并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我们对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永远开着‘爱国一家’的大门”。

这一段话给了程一鸣很大的启发。

一九六四年秋，程一鸣在澳门星光书店买到一卷本《毛泽东选集》，读到《论政策》的一段话：“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

程一鸣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出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他毅然携带武器和特务人员名单投奔社会主义祖国，回到广州开始了新的生活。

程一鸣从澳门回来后，受到中央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和关怀，并予安排，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省政协“三胞”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程一鸣先生对党和政府、政协的安排任用非常感激，他积极履行职责和工作。一九八五年他还带病赴北京出席全国

政协会议。在患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并积极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留下了许多宝贵史料。政府、政协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他，并要求医务人员根据他的病情制定方案，精心诊治护理。但由于他的病情严重，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这是我们政协的一个重大损失。我市政府、政协曾派出领导同志代表家乡各界，前往广州殡仪馆献了花圈，沉痛追悼毅然起义归来后，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程一鸣先生，并对他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黄居素传略

幼 苗



黄居素先生遗象

黄居素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六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年四月十五日）生于中山。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农历丙寅年三月十三日），终于香港。享年九十。

祖父荣盛公，字福安，原籍广东嘉应州（即今梅县），于清同治年间迁居香山县（即今中山石岐），生两子两女，享年八十一岁。长子华廉，即居素父亲也。

居素九岁丧父，家贫，母亲戴氏出为人佣，故他自幼由祖父抚养（二十六岁丧母，母享年四十九。）居素自幼聪慧好

学，祖父对他疼爱有加，而他一生亦极爱其祖父。小时由祖父教导一个时期后，入小学先后约三年，读初中一年，后赴广州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读了八个月，因无钱交学费，故辍学回中山，随乡人郑哲园学《史记》、《昭明文选》等约两年，郑哲园助他办了一时期《岐光报》之后，他赴广州，经友人马时辉及马育航介绍，任陈炯明书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政治活动，任农民部长，及粤军总司令部（许崇智为司令）政治部主任，陈炯明与孙中山先生分裂后，居素首先向吴稚晖倡议陈孙复合，并为此事多次出力奔走（吴稚晖手函有提及，其他文章亦有此记述）。后来他受知于廖仲凯先生。于此期间，廖仲凯推举他担任香山县县长，北伐成功，建都南京，孙中山先生逝世，香山县改为中山模范县，直隶南京国民政府，居素出任首任县长。同期，任南京农民部长及立法院首届立法委员，此时，他向中山县训政委员会提出建中山港计划。

居素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农历辛酉年十二月二十日），与冯端一女士结婚。冯端一，字肃堂，生于一九〇一年农历七月一日，原籍广东鹤山，生于广州，十七岁毕业于广东女子职业学校，留校任教，结婚时二十岁。居素生有四女，皆以所长服务社会。

二十年代中期，他曾先后入住广州光孝寺及杭州一寺院，得与弼元法师及弘一法师相交，后又曾入住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得与熊十力及吕秋逸论学。约一九二七、二八年间，他随近代中国名画家黄宾虹学习山水画，并与之共研画艺，后与黄宾虹及王礼锡从邓秋枚处接办上海神州国光社，成为该社主办人之一。

黄与林森、廖仲凯、陈铭枢、朱执信及邓仲元等均甚稔识。

约在一九三三年，居素脱离政治生活，到香港定居治学。他甚爱山，自此时至一九六四年均居于傍山的东山台（司徒拔道），一九六四年后迁居九龙，于一九六八年底后迁至傍海的美孚新村，直至他去世。其间，他于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五月赴北京小住，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员。

居素对哲学（佛学、儒家、老子、庄子及西洋哲学、尤爱《黑格尔的小逻辑》）、绘画、诗及西洋古典音乐（此中又最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都很喜爱，对前三者，有一定造诣及论述。一九六五年出版《黄居素山水画集》（第一辑）画幅构图较简，并附论画诗，旨在使初学者有径可循、有理可据。一九六九年出版《黄居素山水画集》（第二辑）。从中可见，他的画，风骨、气势、境界及韵律俱优。一九七二年一月“香港艺术中心”为居素举行他的、也是艺术中心的第一次画展，他这次画展对该中心后来得有关方面拨给现址这块地皮，起了帮助作用。一九八五年五月出版《光纲楼诗集》，该集收有居素大部分诗作，近三百首。从中可见他的志与情，他自从一九六八年底迁居美孚新村后，为该寓所取名“光纲楼”，自号“光纲老人”。晚年亦尝绘油画。

他晚年自编其所写杂文，名《缘山堂集》（该名得自其东山台故居“缘山堂”）情此书尚未面世。其中有论及生活、画艺、哲学、政论及受友人所托而执笔的文章等等，关于画艺的，有《中国山水画新论》，提出了以移步换形之移换的内在规律引导至中国山水画之不违反逻辑而超越逻辑；在《曹伯陶先生〈著儒家政治思最〉稿读后意见书》中，提出美之形式须无量，形式虽无量，而均须随时提地随人节之，以防其不美的艺术思想；关于哲学的，如《真如作疏所

缘缘义》记录一文所讨论的唯识宗问题，及对老子的首章解论等；其代友人执笔的文章亦具有一定价值。

居素虽身居香港，经常深切怀念祖国及家乡，每有乡人自家乡来。即问及家乡情况及他住过的街道等，曾多次声言以能在祖国土地牺牲为荣。惜形格势禁，未能酬其壮志。

他早年从政，后来自学，对生活与艺术，始终抱着求知创新的精神；七十五岁时还绘了一张堪称佳作的抽象油画。晚年作画作诗直至九十高龄，也可以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了！现在谨以他在《光纲楼诗》中，复同乡“饮明楼”主的诗《乡梦四绝句寄饮明老乡》来结束本文：

悦来狮子井堪思，梦上烟墩瞰石岐，旧里风尘非
仆仆，应回老兴作儿嬉。

归梦不知山水长，铁城仍是旧时乡；澳门拱北岐关
路，饮明光纲两崇楼，指点隆都隔一江。隔海相望兴欲
浮；顾影联随归棹去，连峰梦享故乡秋。

懒德修成最性真，编归乡梦一同珍；书来逸趣吾能
识，语不惊人自有神。

（注：“饮明楼”在香港，居素之“光纲楼”在九龙，故有隔海相望语）

我的父亲唐绍仪

唐 宝 琚

我的父亲唐绍仪于1938年9月30日被刺遇害，曾经成为震动一时的政治新闻。其后不久，凶手谢志磐又被人暗杀。这样一来，国民党当局对此事装模作样的调查就此不了了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史学界旧事重提，有的论者说他